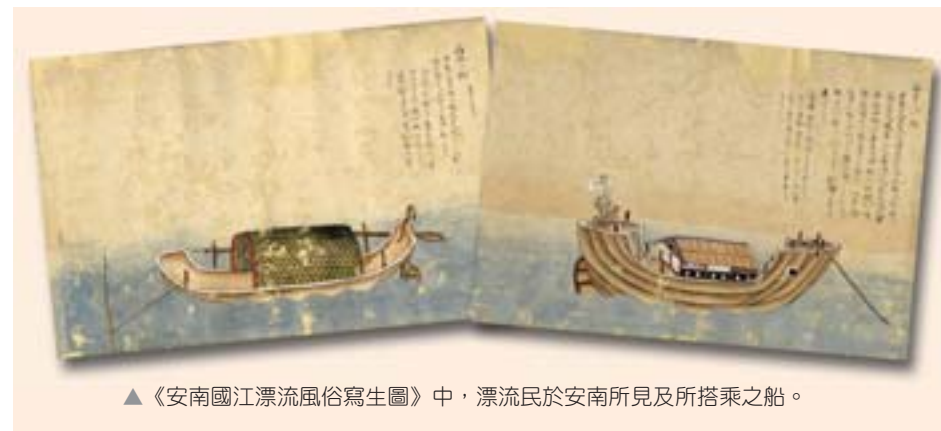


# 漂流記聞

## 館藏「漂流」相關文獻史料

文／張家榮（央圖臺灣分館參考組研究助理）

圖片提供／央圖臺灣分館



▲《安南國江漂流風俗寫生圖》中，漂流民於安南所見及所搭乘之船。

詢問相關的漂流文獻，如有則委請代為抄寫後購入館藏。手抄本多傳抄自東北帝國大學、內閣文庫、長崎縣立圖書館、長崎市役所、宮城縣圖書館以及石井研堂藏書。其中以東北帝國大學所藏的傳抄最多，且集中於昭和4年。

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近將翻譯並覆刻出版館藏《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ヨプラン島之記》一書。該書是描述日本北海道箱館的船隻「順吉丸」，遇強風漂流到東臺灣秀姑巒溪口「チヨプラン」地方，倖存的船長文助歷經種種曲折，於9年後再回到日本的圖文並茂真實記事。

此書為分館前身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於1924年所購得。1927年山中樵擔任總督府圖書館第5任館長後，注意到此書的價值，開始推介研究此書的同時，並於日本各地積極蒐尋有關「漂流」的相關資料文獻。

目前，臺灣分館館藏有關「漂流」的資料共計64種、88冊，除前述《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ヨプラン島之記》（含川北本與黑川本），另有《安南國

江漂流風俗寫生圖》、《波丹人漂流記》、《阿南漂流記》、《呂宋國漂流記》、《船中日記》、《米利幹漂流記》、《渡唐草》、《漂客譚記》、《巴坦漂流記》、《肥後壽之郎等書狀寫》、《南瓢記》、《迷復記》、《漂到四靛蠻國并相馬領漂民》、《漂流叢書》、《漂海記聞》等，這些大多為手抄本，內容多記錄日本人或琉球人的異地漂流，時間則分布在17至19世紀左右。

這些資料大部分為山中樵時期蒐購所得。山中樵先寫信到日本內地的圖書館、內閣文庫、史料編纂所等處，

此外，長崎縣立圖書館與長崎市役所的漂流相關紀錄，是山中樵於昭和5年（1930）到東京時，途中繞經長崎抄錄而成。

除抄寫外，也有來自寄贈，如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稻垣孫兵衛，於昭和6年（1931）寄贈《米利幹漂流記》一書。另外，部分購自專門研究漂流議題的石井研堂氏，例如《日本漂流譚》、《漂流叢書》（漂流奇談全集原稿本，共九冊）、



▲《安南國江漂流風俗寫生圖》中，漂流民於安南國內所見到西洋人和黑奴（左），以及當地住民（右）圖象。

《漂海記聞》（共四冊）等。也有從其他古書店購入者，如《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ヨプラン島之記》（川北本）便是從東京的井上書店購入。關於此書，不管是川北本還是黑川本，在日本當地均找不到相同的版本流傳。

這批有關漂流的文獻資料，在記載形式上可分為口供筆錄以及風土記兩種。口供筆錄是漂流者回歸日本後，由長崎奉行所進行審訊及記錄的官方文書；風土記則較接近故事敘說，有漂流者異聞，也有從官方文書添加情節轉敘而成。不管是口供筆錄或是風土記，內容敘述通常包含：第一，漂流者本身背景介紹，包括船主出身、船員人數、所駕船隻大小等；第二是船隻遭難與漂流的經過；第三為漂流異地與歸國過程中，所見到的異地風土民情與見聞。上述三項可說是構成漂流事蹟的主要元素。然而重要的是，這些敘述多數可從中日官方文書中找到相關記載，顯示這些事蹟有一定的真實性，部分文獻則更記錄了當地的語言詞彙以及清朝官方文書資料。

關於漂流地區，以現今區域而言，包括中國（大清）、韓國（朝鮮）、臺灣、越南（安南）、菲律賓（呂宋）、印度（天竺）、美國（米利幹）、俄羅斯（魯西亞）等地區，範圍極廣。其中，日本人漂流至中國、



▲《船中日記》內記載之大清國江南福興丸（左），以及賣雞蛋小販與牙醫師（右）。

臺灣、越南、菲律賓、印度等地者，通常會送往清國，再依清朝慣例，直接送往浙江乍浦使其歸國；琉球人漂流到上述地方者，則送到福建福州再轉遣琉球。此批文獻部分繪有插畫，圖繪有的粗糙有的精細，或黑白或彩色，然都有重要參考價值。因篇幅有限，這裡略舉四冊作為介紹：

1. 《安南國江漂流風俗寫生圖》，為卷軸式圖錄，記錄年代為寬政6年（1794年），計49幅彩色圖繪，畫風精細。內容藉由圖繪，略述日本人漂流至安南廣東一帶所見風土人情及當地器物，具極高的史料價值。

2. 《船中日記》，為1762年左右，日本人漂流至中國事蹟，文中敘述乾隆時期淮安府、常州府、蘇州府、松江府等地的風土民情，圖繪部分繪有淮安府南通州城圖，以及商船、錢幣、商賈等圖，極其生動。

3. 《漂客譚記》，為1828年

左右日本人漂流至呂宋，後經由廣東送往乍浦回國之事蹟。本書分上下冊，黑白圖繪43幅。該書特色在描述漂流及遣返歸國經過時，佐以大量的圖繪說明，令人有身歷其境之感。

4. 《米利幹漂流

記》，為1841年左右日本人漂流至美國事蹟，從書內的漂流路線圖來看，可算是日本人漂流過程中最遠的一次，幾乎環繞了整個地球。內容除了描述漂流經過外，圖繪部分包含電力、輪船、火車、衣物等，提供了19世紀中葉日本漂流民眼中的美國生活圖象。

綜觀漂流事件的紀錄及出現的年代範圍，顯現地理大發現後，船隻往來頻繁，船難的頻率也隨之增高。從中、日的官方記載中，可看出官方在處理這些漂流民時呈現不同的對待方式。有趣的是，清朝在處理日本漂流民似顯寬大為懷，與漂流民回到日本反遭長崎奉行所嚴厲訊問，呈現對比。這或許是清朝自許泱泱大國，以及當時江戶幕府鎖國，對基督宗教心懷警戒，導致兩方採取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。



▲《米利幹漂流記》中所繪的漂流路徑圖。